

## 日 本

20 世纪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曾经遍布哲学、社会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各个领域，“大冢史学”、“望月史学”、“宇野经济学”、“市民社会派”、“现代理论学派”等各家学派林立，精彩纷呈。但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 2010 年以后，不仅研究马克思哲学和思想的中青年学者十分少见，甚至曾经从事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也纷纷转向。例如，日本新左派代表人物内田弘已经转到对《资本论》定理和结构的分析；以研究马克思联合思想闻名的田畑稔在 2005 年以后再未出新作，文章也以书评或介绍为主；而当下最受中国关注的柄谷行人虽然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但是他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公共知识分子，并不被主流学界接受。总之，日本的马克思研究呈现向经济学领域一边倒的态势并且愈演愈烈。

2018 年似乎出现了转机。首先，本年度最令日本马克思学界振奋的事件是，从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斋藤幸平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国际奖项——多伊彻纪念奖。作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日本人以及史上最年轻的获奖人，斋藤幸平的获奖不仅证明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水平，也给“唯经济学”的研究局面打开了缺口。其次，百木漠发表了日本第一部专门研究阿伦特和马克思哲学思想联系的学术著作。最后，马库斯·加布里尔的新实在论在日本思想界掀起空前的研究热潮，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受到了

感染，加入对哲学问题和现代性批评的讨论当中。2018年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对哲学思想的关注度高于往年。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经济学领域，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MEGA<sup>2</sup>第11卷刊行10周年，大谷禎之介出版专著，通过梳理《资本论》第2、3卷的遗稿分析马克思的思想轨迹。在雷曼事件爆发10周年之际，青年学者江原庆发表著作分析资本主义市场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另外，作为早年作品《马克思经济学》（第2版）的附属读本，大西广的新作《用唯物史观解读国际事件》，同时介绍自己近年来关于《资本论》数量化的研究成果。

本报告共有六个部分。其中，第一至三部分介绍马克思经济学领域的代表性成果；第四至六部分介绍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事件和研究。从整体上看，2018年，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大致上平分秋色。不过，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相继退休，这些学科的毕业生大多只能去经济学科谋取教职的情况下，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面临着在大学无人可教、无人能学的窘境。由此看来，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苏仍然任重道远。

## 一、《资本论》手稿的修改轨迹和理论进展

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MEGA<sup>2</sup>第11卷刊行10周年，大谷禎之介教授发表专著《从资本论手稿读马克思的苦斗：〈资本论〉第2卷第Ⅷ稿全文及相关资料收录》<sup>①</sup>。大谷教授在前言里首先提到马克思的两封信。1867年4月，马克思写完《资本论》第1卷后在致齐格弗里特·迈尔的信中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sup>②</sup>。1882年，完成《资本论》最后的手稿后搁笔半年的马克思给女儿燕妮的信中说：“我对迈斯纳关于需要出《资本论》第一卷新版即第三版的通知颇为不满。本来我想一俟我重新觉得自己有了精力，就以全部时间专门从事第2卷的收尾工作”<sup>③</sup>。为了完成

① 大谷禎之介：「資本論草稿にマルクスの苦闘を読む：『資本論』第2部第8稿全文とその関連資料を収録」、奈良：桜井書店、2018年。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5页。

《资本论》第2卷而殚精竭虑的马克思跃然纸上。大谷教授把这本关于编集、研究《资本论》手稿的著作命名为“马克思的奋斗”，从研究者的角度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为了《资本论》第2卷而奋斗的轨迹。

该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四个章节，主要讨论《资本论》对于马克思意味着什么。第一章“马克思的遗稿是被诅咒之环吗”，介绍了《资本论》手稿从最初的反复修改、到马克思死后的颠沛流离、最后MEGA编委会辗转成立的波折命运。第二章“为变革‘现代社会’的‘资本的一般性分析’”，分析了《资本论》的对象是“现代社会”，《资本论》的特征是对“资本的一般性分析”，并且该特征不同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对象“资本一般”。第三章“《资本论》与联合”提出四个命题，分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孕育着联合、资本自身在生成否定自己的形态中成长、资本的矛盾推动联合的诞生、形成联合的是劳动着的个人的实践行动。第四章“MEGA编辑、刊行的现状和展望”介绍了MEGA是什么，以及完结的第2部门和待完结的第1、3、4部门的情况。

第二部分也包括四个章节，主题是以《资本论》第2、3部手稿为对象介绍《资本论》的创作史，即马克思是如何为《资本论》“奋斗”的。第五章“读《资本论》第2卷第Ⅷ稿”，是MEGA<sup>2</sup>第11卷收录的《资本论》第2卷第Ⅷ稿及附属资料的日译本。第六章是作者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3部手稿执笔期间”的考证和研究。第七章“为完成《资本论》第2卷的奋斗轨迹”是作者根据MEGA<sup>2</sup>第11卷收录的《资本论》第2卷的各个草稿，分析马克思是如何艰难奋斗的，又是如何推进对资本的研究的。该章是本书的核心，笔者会在后面具体介绍。第八章分析的是《资本论》第Ⅱ稿第3章的标题“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实体的诸条件”有什么含义，是第七章的补论。

第三部分收录了作者多年以来，沿着马克思的奋斗轨迹，在研究《资本论》手稿之余的其他主要思想成果。其中包括对马克思的价值形式论、货币生成论等研究以及若干书评。

接下来是对本书核心内容的介绍：

2008年3月，作者负责的MEGA<sup>2</sup>第11卷出版了。该卷收录了1868年以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2卷的各版草稿和残篇。作者认为，恩格斯修订稿与马克思手稿的最大不同是，前者没有显示出马克思为《资本论》第2卷奋斗的思想轨迹。

恩格斯修订稿的编辑方针是，“尽可能把我的工作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文

稿方面。因此，我总是把最后的文稿作为根据，并参考了以前的文稿（中略），我总是设法完全根据作者的精神去解决这些困难”<sup>①</sup>。在这样的方针下，恩格斯修订稿的第一篇采自第Ⅳ—Ⅷ稿并打乱了顺序，第二篇首先采自第Ⅳ稿，然后采自第Ⅷ稿，第三篇以第Ⅷ稿为主，中间穿插第Ⅱ稿。恩格斯的编排使分辨各草稿的理论到达度十分困难，尤其是第Ⅷ稿和第Ⅱ稿交叉使用的第三篇。另外，在仅采用第Ⅷ稿就足够的第21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中，恩格斯添加了许多自己的见解，以致很难看出马克思的思路。恩格斯还把马克思的“第Ⅱ部类的积累”分成“第Ⅱ部类的积累”、“用公式来说明积累”、“补充说明”三节，抹煞了马克思解决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问题的思考步骤，更没有理解马克思的苦心。

手稿的第Ⅱ稿内容最丰富，占据第11卷大半部分。马克思计划把第Ⅱ稿分为三章，对第Ⅰ稿进行完全的重写。在大谷看来，第Ⅱ稿相较于第Ⅰ稿的理论进步有以下几点：

（1）资本循环论和资本周转论的进步。第Ⅰ稿分析了资本的四种循环：a 货币资本的循环；b 包括生产资本诸要素的被买入的商品的循环；c 生产资本的循环和 d 商品资本的循环。马克思随后认为在 b 循环中，商品中的资本也可以称为“商品资本”，因此 b、d 都属于商品资本的循环。马克思还发现，“商品资本”的用语只适用于表达转化为货币的商品形式中的资本，因此 b 循环应被收进 c 循环。因此，第Ⅱ稿变成了货币资本的循环、生产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本的循环三种形式。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第Ⅱ稿意识到把资本的运动理解成资本不断变化的循环的重要性。第Ⅱ稿还明确意识到资本的循环运动和劳动力的变化运动的区别以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

（2）折旧资金挪用到积累资金的可能性问题的解决。有一个困扰马克思多年的问题：可以把固定资本的折旧资金挪用到积累资金用于扩大生产吗？这个问题在第Ⅱ稿得到了解决：a 只要单个的资本家有权对固定资本的性质或事业经营的种类进行部分的更新，就可以把折旧资金投入扩大生产；b 这种扩大的生产从整体看是扩大规模的再生产，从个别资本来看则是不必经过剩余资本向资本的转化过程，通过缩短周转时间增加价值的增值；c 即便折旧部分以这种方法扩大了生产，但折旧资金也不能成为积累资金。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3) 资本与资本、资本与收入、收入与收入的交换想法的放弃。第 I 稿第 3 章开篇的两个条目分别是“资本和资本的交流、资本和收入的交流和不变资本的再生产”与“收入和资本、收入和收入、资本和资本(它们之间的交换)”。这表明,马克思认为社会总体再生产过程的运动的核心在于资本、收入相互间的交换。这种观点模糊了资本的循环和商品间“实体的素材转换”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还没有完全克服古典经济学的“无区别的混同”弊病。而到了第 II 稿第 3 章,关于“交换”的分析几乎没有了。

(4) 再生产图式的登场。第 II 稿分析社会总体再生产过程时,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再生产图式。

(5) 关于第 3 章课题的新观点。根据资料推测,第 I 稿第 3 章是要在第 1、2 章考察“流通和再生产”的形式的基础上,论述“流通和再生产”的“实体的诸条件”。第 II 稿第 3 章则讨论了第 I 稿第 3 章中还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内容: a 资本的循环过程: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 b 资本家收入的变形:商品资本中表示剩余价值的部分→货币→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手段; c 劳动者的劳动力变形:劳动力→货币→必要生活手段。本章的课题即是以商品资本的循环为基础,全面考察以上三种循环或变形相互之间是如何发生关系,进而形成社会总体再生产过程的。

作者接下来指出,《资本论》第 2 卷的第 V、VII 稿主要体现了马克思与资本循环论的“格斗”,从中分析出马克思获得的战果主要是以下两点:

(1) 货币资本的货币功能与资本功能的明确区别。马克思在第 V—VI 稿中试图明确资本循环过程和一般商品流通的区别和联系,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货币资本的货币功能和资本功能的区别和联系。而到了第 7 稿时马克思说:货币能买卖劳动力,买者是生产手段的持有者——资本家,卖者是只有劳动力的劳动者;买者和卖者的阶级关系的“定在”使得单纯的货币功能转换成资本功能。由此可见,马克思只关注个别资本独立的循环运动本身,而不再关心货币和资本的位置变换形式。在这里,马克思在根本上脱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中立货币观。

(2) 商品资本循环独立性的明确化。在第 II 稿中,商品资本的循环只是作为资本循环三形态中的一种,还没有获得完全的独立性。而第 V 稿中马克思更正了这个错误,他指出,商品资本的循环是魁奈《经济表》的基础,魁奈没有选择生产资本的循环是伟大的、正确的。商品资本的循环的独立性在于,只有

在商品资本的循环的情况下，商品才作为生产资本的前提出现。

最后，第Ⅷ稿第3章相较于第Ⅱ稿第3章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对斯密教条的最终总结。斯密认为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仅分为工资、利润、地租，这三种收入决定商品的价值。在第Ⅷ稿里，马克思把这一理论称为“斯密教条”，批评斯密混淆了产品的总价值与产品中所包含的新创造的价值，忽略了不变资本的价值。“斯密教条”标志着马克思对斯密批判的最终完成。

(2) 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的叫法变更。在第Ⅰ、Ⅱ稿中，马克思把消费手段生产部门称为第Ⅰ部类，把生产手段生产部门称为第Ⅱ部类；而在第Ⅷ稿，则把生产手段生产部门称为第Ⅰ部类，把消费手段生产部门称为第Ⅱ部类。关于颠倒称呼方式的原因，学者有很多不同的见解。

(3) 放弃二重叙述方法与货币运动的全面引入。第Ⅷ稿第3章中，马克思放弃了分析社会总体再生产过程时使用的“舍去货币流通的叙述”和“伴随作为中介的货币流通的叙述”的双重叙述方法，从一开始就引入货币运动观察再生产过程的进行。

## 二、资本主义市场与经济危机

2018年是雷曼事件即美国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宇野派经济学的青年学者江原庆发表专著《资本主义市场与恐慌理论》<sup>①</sup>，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重新梳理了资本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恐慌（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者指出，设想中的市场经济是一种需求和供给的均衡，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受到特殊的历史条件、制度条件的影响，往往表现为供需的不均衡，为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系统的稳定性，反过来说，资本主义市场在何种状况下不稳定，是值得探究的。资本主义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系统缺陷就是涵盖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危机，即恐慌问题。恐慌是资本主义历史变化中最主要的现象之一，其变化是牵涉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的理论问题，对资本主义市场的解读理应包含恐慌论。基于上述理由，作者把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生产价格论、市场价格论的重构、资本主义市场的无规律性三个方面入

---

① 江原慶：『資本主義の市場と恐慌の理論』、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2018年。

手，有意识地与供给均衡论保持距离，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的独特结构阐明资本主义体制的构成机制；第二部分从恐慌的基础和商业资本两个角度出发，把资本主义市场的变动理解为原理层面的恐慌论，以此达到总览资本主义市场整体面貌的目的。

下面具体介绍两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资本主义市场的结构。宇野弘藏的分配论指出，产业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大利润，就会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资本流动，但是，当确定的生产过程和不确定的流通过程之间的反差成为确定以后，个别资本在不断扩大的相互竞争中如何解决流通过程的不确定性就成为问题。市场不断变化，个别资本一边受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制约，一边不断扩大与其他资本的交易，这构成了宇野经济学中原理论发展的土壤。但另一方面，人们一直重视流通过程的不确定性与生产过程的确定的区别研究，乃至出现二者被割裂开来的研究倾向。市场机制论的研究成为热门，但是市场机制中的流通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关系却被忽略了。因此，作者从流通过程的不确定性概念入手，将其与由固定资本规定的生产过程中的不均质性合并来理解。换言之，只有同时意识到流通过程的不确定性和生产过程中的不均质性，资本主义市场的结构才能够显现。

作者认为，显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结构在理论上不应被还原为市场机制论，正如地租论不只是农业领域的问题，而应被理解为讨论生产过程中处理生产条件差异的又一个理论领域，地租对资本主义市场产生的影响有必要加以特殊的解释。在地租论中，生产条件的重要特征不在于再生产，而在于能够限制地租的所有权的设定，因此，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劳动者的第三阶级——地主，作为不能再生产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成为考察的对象。如果说资本主义市场是个别资本间展开竞争的场所，那么包括地租论的资本主义市场理论，则应该涉及资本家和地主的关系；此外，即便是不能再生产的生产条件，事实上也受资本的控制。因此，考察生产条件的优劣对于地租论也同样适用，并且是分析地主的行为及影响的基础。更进一步说，以往的地租论仅限于解析其静态的结构，而没有追问地租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关系，地租论有必要和资本积累的发展放在一起研究。

作者还指出，市场价值的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运行的过程中被重新规定了，只有限制价值的价格时才有意义。并且，如果市场价值论就是对供需均衡论的市场的理解，那是不能充分体现出市场价值论的重要性的。如果市

场理论就是供需均衡论，在市场中是不会正确把握资本主义的固有性格的，换言之，会抹杀理解资本主义特有市场的运行方式的视角。那么，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场上分析市场理论，应该如何看待供给均衡论呢？作者提供的思路是，从利润论的角度，在固有的资本主义市场中规定制约市场价格的价值形式。就是说，首先，理解同时运转多个生产条件的社会再生产，把握市场的“价值”等特性；其次，立足于资本主义市场中不同部门间的竞争方式，把投资类型大致分成两种：需求差异追求和特别利润追求；最后，明确对两种投资行动下的市场价格的限制方式，重新规定市场价值概念。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市场与恐慌。在资本主义市场，伴随个别产业资本不断投资，不仅部门之间的资本分配和社会性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变化，整体的资本规模也在扩大。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这种扩张状态本身作为一种有意义的变化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整体伴随着积累，在某个时点就会发生不可避免的生产规模的急剧收缩，恐慌论就此形成，并成为关于积累过程中的重要理论域。作者认为，把恐慌论扩充进资本主义市场原理的分析丰富了市场恐慌理论，该种观点不仅与宇野派的恐慌论不同，也有别于被公认为重视市场要素的商品过程论等视角。

《资本论》中关于恐慌的论述很分散。第1卷第3章提及了买卖分离引起恐慌的可能性，第1卷第23章提及了积累过程和过剩人口的动态情况，第2卷第21章提及了扩大再生产的均衡条件及其背离，第3卷第15章提及了资本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过剩，等等。但是这些论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联系，也很难由此系统地析出资本主义经济中固有的恐慌概念。此后的马克思主义恐慌论研究一直致力于恐慌成因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并形成了商品过剩说和资本过剩说两大潮流。商品过剩说认为恐慌的原因是，市场上商品的供给相对于需求来说过剩，进而导致利润率下降；资本过剩说则认为商品的供给过剩不过是资本过剩积累的表现，与恐慌相关的利润率下降先于商品过剩发生。

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恐慌论不应该只讨论恐慌的成因，也应该包括与资本主义历史性的关系。宇野弘藏的《恐慌论》则是代表性作品。《恐慌论》指出，景气、恐慌、萧条三者交替进行，这种循环过程的分析成为恐慌理论的一部分，恐慌处于循环状态下，所以无法从理论上证明恐慌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崩溃。《恐慌论》还把恐慌论和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发展的阶段论连接起来，例如，把19世纪处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阶段的英国，其



每隔 10 年周期爆发一次的经济危机称为“典型的恐慌现象”，而 19 世纪后期以后，经济危机越来越突然和全面，则意味着资本主义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这样，恐慌论成为与积累论一样能够体现资本主义历史性变化的理论域。

作者赞同分析恐慌论时介入历史性视角，但他同时指出，《恐慌论》在解释资本主义历史性变化时，是将恐慌与景气、萧条并列在一起的，但是，恐慌的变化才是经济循环中的核心和基础，恐慌是考察经济循环过程时最重要的指标。作者还认为，比起恐慌现象的“周期性”、“全面性”、“爆发性”等特点，逻辑先行的从景气初期到景气末期的变化才是恐慌论的首要研究对象。宇野弘藏以后的宇野经济学认为恐慌的根本原因是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资本过剩，而资本过剩的顶点是工资高涨，换言之，工资高涨是恐慌的深层原因。在作者看来，工资高涨是经济景气期进入尾声的明确的转折点。而引起工资高涨的原因是价格评价的困难和产业预备军的枯竭，换言之，价格评价困难和产业预备军枯竭才是恐慌的根本原因。此外，宇野的恐慌论一方面认为资本过剩是恐慌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又提出信用机构的动向也对恐慌产生重要影响。作者也认同这种观点。他指出，伴随资本主义信用机构的作用从资金媒介向信用创造转换，商品价值的实现场所即市场作为信用制造的基地，对恐慌的影响力提升了，而要从理论上把握信用制造的功能，则必须明确信用货币的理论定位。

### 三、唯物史观的实际运用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西广近年来从京都大学调入庆应大学经济学系，授课内容是其早前出版的教材《马克思经济学》（第 2 版）。2018 年 4 月，大西广发表著作《长期法则和马克思主义——右翼、左翼、马克思》<sup>①</sup>，该书由作者在庆应大学的讲课资料以及近期的大会报告组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相当于《马克思经济学》（第 2 版）的副读本。该书还涉及了安倍经济学、特朗普政权上台、中国崛起、英国脱欧等国际重要事件，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它们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者指出，推动历史的原动力是生产力，上

---

① 大西広：『長期法則とマルクス主義——右翼、左翼、マルクス主義』、東京：花伝社、2018 年。

层建筑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进而会出现政治上的对立乃至霸权之争……这样的历史观即是唯物史观，它是一种长期法则，我们判断和评价左翼、右翼乃至马克思主义都应该在这种长期法则的唯物史观的视角下进行。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1部分的题目是“作为长期法则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该部分由3个章节和书评组成。第1章“以国家主义为敌，以无政府为理想”在分析西方左翼运动后指出，当下的左翼都在向国家主义倾斜，而马克思主义最初的立场本是“国家的扬弃”，是“无政府主义”的；“二战”以前的左翼反对国家主义和统治者，而现在的左翼则反对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站在了国家主义的立场上。第2章“何谓对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认为，在重视供给侧这一点上，马克思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相近，与重视需求侧的凯恩斯派有很大区别。凯恩斯派不考虑榨取和生产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则相反。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提出的废除政府干预、小政府论等思路与马克思派接近。表面上看，安倍政权是新自由主义立场，但实际上却是国家主义，安倍经济学与凯恩斯派一脉相承。第3章的标题是“民主改革论的‘失败’和马克思派的经济政策论”。马克思主义派有一个经济政策叫民主限制论。就是说，一切实质都是关于生产的决定权，生产手段的个人所有即是指国民获得生产的决定权。这意味着形式上的私人所有，内核却是国家或工人掌握着决定权，例如国家、工人介入价格、工资、投资、雇用等。另外，社会民主主义更关心分配问题，因此总是表现为“大政府”立场。这样会导致掌权者干预应该分配给每个公共事业多少资源。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这种干预，在这方面与马克思派是一致的。

第2部分的标题是“右翼、左翼、马克思主义”，包括第4、5两个章节。第4章“您是右翼还是左翼？”的主要观点是：通常情况下，主张全球范围内放松干预的是右翼，相对的国有论者、干预论者是左翼；但作者认为应该给左翼和右翼下一个新的定义，即站在社会弱者一方的是左翼，站在强者一方的是右翼。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派是左翼，但是右翼和左翼都有其历史意义，对它们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和分析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第5章“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和在野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经济学是“执政党的马克思经济学”，主要沿袭着国家主义的政治体制；日本和欧美的马克思经济学其实是“在野党的马克思经济学”，以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主流。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里主流的马克思经济学和国家制度相呼应。但是，马克思

经济学不应是由历史解释的对象，它本是一种超越时代制约的历史理论。

第3部分的标题是“中美霸权更迭和全球化”，由3个章节和补论构成。第6章的题目是“特朗普上台所意味的中美霸权更迭”。文章认为，当下的国际纷争、国际摩擦归根结底都是由“不均等发展”引起的，美国的特朗普现象正是“不均等发展”的体现。对于制造业衰落的美国来说，自由贸易不利于美国，因此美国国民选择了保护贸易的特朗普。推进自由贸易的一方从前是美国，现在则变成了中国。下一个霸权国家是中国，但一定会比美国的霸权统治要好得多，因为这种更迭犹如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一样，是历史的进步。第7章讨论的是英国脱欧时的国民投票问题。作者的关注点是，在脱欧或留欧问题上，有多少国民是在非常迷惑的状态下投票的，投票和年龄、阶级和学历是否有关。通过数据的分类对比研究，作者认为脱欧派多是坚决投票的，而留欧派则是怀着“次善的选择”的心情犹豫着投票的。作者以此反思代议民主制多数者投票悖论的问题。第8章分析了2014年下半年香港的学生运动，文章认为，这场运动实质上是财团和普通市民间的阶级斗争，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香港的经济地位在下降，内地向香港的人口流入导致物价上涨、贫富差距拉大，等等，都是运动的潜在原因。最后，补论“论马克思学者的和平论和中日关系”是作者的一篇演讲稿，讲稿提到，日本国内的右翼舆论对中国的感情比较抗拒，原因在于中国近年来飞速的经济发展。在作者看来，日本对中国不应该对抗，而应该“利用”，世界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既是事实，也对日本有利。

第4部分的标题是“以新古典经济学派为基础的马克思经济学”，由两个章节构成，都以马克思经济学的最优增长论为主题，这也是作者近年来研究《资本论》数量化的最新成果。作者指出，最优经济增长论的出现最初是为了推导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在逻辑结构上，它与现代经济学的诸多概念也存在接续的可行性。另外，近年来出现了否定“价值”与“价格”二重体系、提倡单一体系的新解释派，在作者看来，这种思路虽然可以解释一些现实经济现象，但在理论上却站不住脚，因此，需要在最优经济增长论的视域下对价值与价格的区别进一步探讨。作者指出，劳动价值论的创始者亚当·斯密不懂得极限理论，把劳动理解成“辛苦和麻烦”即“非效用”，认为劳动投入量才是事物的真正价格即价值；但是，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应该是在“辛苦”和“效用”之间寻求最优化行动，增加1单位劳动后获得的辛苦与效用的平衡即是劳动量，投入生产的劳动量才是

衡量价值的标准。但在现实层面，价格的制定却不取决于投入的劳动量，而在于货币资本家对分配的抑制。根据《资本论》第3卷的生产价格论和级差地租模型来计算，价格与“价值”也是相背离的。总之，马克思衡量商品有三种标准：价值、生产价格与价格，而价格又分为纯粹的市场价格和现实的垄断价格体系。最优经济增长模型既包括对劳动投入的最优分配进行顶层整体规划的模型，也包括分权的市场模型。

#### 四、多伊彻纪念奖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大阪市立大学副教授斋藤幸平的英文著作《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然与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sup>①</sup> 获得了2018年多伊彻纪念奖(Deutscher Memorial Prize)，该奖项创立于1969年，是为了纪念波兰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和他的妻子塔马拉·多莱彻设立的，每年颁发给“最佳的和最有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论述著作”，是目前国际上马克思主义领域最具权威的奖项。斋藤幸平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日本人，同时也是该奖项设立以来最年轻(31岁)的获奖者。

该书认为，生态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旁枝末节，它是马克思终其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系统性的重要议题。作为MEGA第4部门编辑的参与者，作者深入研究了马克思晚年讨论自然科学的摘要笔记，同时还借鉴了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等学者的著作，认为马克思实际上看到了嵌入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斋藤说，如果忽视生态维度，就不可能全面理解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构图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批判与生态危机批判融合的基础上，而马克思的生态学研究是不可或缺的理论参照系。

由于该书的日文版尚未出版，所以无法详细介绍书的内容。但我们可以通过国际上知名学者对该书的评价一窥其价值和内涵。

迈克尔·哈特认为，在今天，人们益发清醒地意识到，要对抗气候变动和全球性环境危机，就必须以资本批判作为中心课题。在这当中，许多研究者

---

<sup>①</sup>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7.

和活动家针对环境问题都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这本精彩的书反映了斋藤幸平为生态资本主义批判课题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因为它呈现了马克思本人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系统性的生态学的理论结合。

凯文·B·安德森认为，斋藤的书在今天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灾难。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理论框架，这些危机是不可能得到充分解决的。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向我们表明，马克思给了我们比我们曾经认为的更多的东西，我们现在可以更接近完成马克思的批判，并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生态文明世界。斋藤的书的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了解，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争论。斋藤为这场辩论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新来源：马克思即将出版的生态学笔记本。这促成了对马克思的一种新的解释，考虑到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生态危机，这种解释是及时的。

迈克尔·海因里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已经有关于生态方面的重要研究，但斋藤幸平是第一个深入马克思的笔记本，讨论马克思的研究过程的人。斋藤不仅对马克思的著作有很好的了解，而且他还熟悉马克思的资料来源。他提供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展示了生态问题与马克思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项目有多么紧密的联系。

鲍勃·杰索普：在这种文献学上的复杂、取证上的无情和理论上的微妙分析中，斋藤幸平巧妙而有说服力地追溯了马克思批判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连续性，以及他与昔日的哲学意识的决裂，他转变了关于技术进步的乌托邦式观点，并日益认识到资本积累的生态局限。斋藤展示了马克思对把自然的转变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的统一历史科学的持久承诺，他创造性地借鉴了马克思的摘录、个人笔记、书信、手稿和出版的作品，展现了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跨史学描述和对资本积累所产生的生态危害的尖锐批判。这本宏伟的著作描绘了在马克思的理论实验室中探索其智力实验的有启发性的潜力，扩展了我们对马克思 40 多年来的工作的理解，远远超出了其生态学方面，并为其他生态社会主义者解读马克思提供了精准的评论。像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这是一本要研究的书，而不只是一本要读的书。

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即将出版的日文版更换了原来的学术性标题，变成了对大众更有吸引力的《大洪水之前：马克思与行星的物质代谢》<sup>①</sup>。这个看

---

① 斋藤幸平：『大洪水の前に：マルクスと惑星の物質代謝』、東京：堀之内出版、2019 年。

似难解的书名的意思是，我们要回到马克思，在大洪水到来之前解救地球这颗行星。“大洪水”取自马克思晚年的摘要笔记，行星指代地球。作者要表达的是：环境危机已经严峻到行星规模的地步，但资本的运动却不受任何事物左右，“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是每个资本家的口号。马克思把自然的掠夺、滥用视为与劳动力掠夺同样重要的问题，并批评它是物质代谢的裂痕，要想修复全球物质代谢的裂缝，必须与资本的运动对抗。

## 五、后现代—形而上学批判与“新实在论”

2018年，德国波恩大学教授、新实在论者马库斯·加布里尔的成名作《为什么世界不存在》<sup>①</sup>日文版一经问世，瞬间在日本哲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掀起了讨论风暴。事实上，这并非加布里尔第一次进入日本人的视野，在3年前，加布里尔其人及思想在日本的思想类杂志《Nyx》首次被介绍，同年，他与齐泽克的合著《神话·癫癲·哄笑——论德国观念论的主体性》被翻译成日文并出版，在当时就已经受到日本学界的极大关注。而本年度《为什么世界不存在》的出版则使这种关注继续升温，《Nyx》《现代思想》等思想类杂志发表多篇关于新实在论的研究论文和对谈<sup>②</sup>，一桥大学、东洋大学等高校主办了多场专题讨论会，加布里尔本人在6月来到东京和京都进行了半个月以上的新书发布和宣传，共开展了6场讲座。不仅如此，日本最大的电视台NHK也对加布里尔进行跟踪采访和报道，并在年底将报道内容整合成《马库斯·加布里尔——“哲学”欲望的时代》<sup>③</sup>一书出版。加布里尔吸引了包括西方哲学、日本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哲学各领域学者的目光<sup>④</sup>，因此，笔者认为，介绍这场哲学热潮是很有必要的。

---

① マルクス ガブリエル：『なぜ世界は存在しないのか』、清水一浩訳、東京：講談社、2018年。

②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思想》杂志，它不仅在2月发表一组新实在论的专题文章，并且还临时加刊，全书专门讨论加布里尔，内容包括采访、讲授、批评、讨论、回应批评、新实在论的诞生、谢林及德国观念论的复兴、与海德格尔的对决、精神哲学、艺术的意味等多个版块。『现代思想』46（14）（临增）、2018年10月。

③ 丸山俊一：『マルクス ガブリエル 欲望の時代を哲学する』、東京：NHK出版、2018年。

④ 笔者认为，加布里尔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关注，和他与齐泽克合著有一定的关系。

在介绍日本学界的讨论之前，先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世界不存在》的主要观点。本书包括两个基本命题，“世界不存在”的“无世界观”命题和“新实在论”的“意义场所的存在论”命题。存在的东西必须要有这样或那样的性质，必须与某种意义的关联中才能存在。就是说，存在就是在某个意义场所发生现象，“存在”和“场所”不可分割。而所谓世界，是一切意义场所的意义场所，是其他一切意义场所都在其中发生现象的意义场所。由此推导出的问题是：这个包含一切意义场所的意义场所的世界，其自身在哪里存在呢？如果世界存在，那么世界就必须在某个意义场所发生现象，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世界不存在。

综观研究论文、访谈和研讨会，整个日本哲学界对加布里尔的共同关注点包括：

第一，自然主义批判。加布里尔的“无世界观”直接针对“自然科学的世界像”。因为世界不存在，所以把自然科学作为认识世界的尺度站不住脚。意义场所是无穷的和多层次的，自然科学只是其中一个意义场所；即便是人们日常的细微情感和无聊的幻想，在与实在的关系上也和自然科学处于同样的地位，并且前者的意义场所在数量上占据压倒性优势。自然科学无法解释日常意义的世界的全部。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能通向唯一实在的看法是错误的，这种自然主义把特定的意义场所特权化了。当下流行的针对人的智能化管理和数字化管理的世界观也属于自然主义的一种，这种世界观是虚假的。

第二，结构主义——后现代一形而上学批判。加布里尔认为，后现代的最初目的是要批判传统西方形而上学，但最终却陷入了结构主义，“意义场所的存在论”是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后现代的原罪要追溯到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及后来的德里达一直寻找逃离形而上学的出路。他们希望通过分析人的活动性来找到形而上学的漏洞。这意味着人类的所作所为代替现实而成为中心，进而在不知不觉中自己构建了现实。这种被构建的现实就是结构主义。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区分了“发现”和“制造”，并认为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发现”一切，而我们则是“制造”一切。他们的观点和美国的实用主义在本质上是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罗蒂和德里达可以说是后现代的顶点。

形而上学就是预设了向我们显现的事物与现实中存在的事物本身的区别，并完全去除“弄清楚现实中事物是如何存在的”这一人的认识行为。而后现代则是原封不动地翻转形而上学的思路，主张只有向我们显现的事物才存在，显

现外的更进一步的东西包括世界或现实本身都不存在，即便存在也与人类毫无关系。据此，后现代陷入了一种被称为“结构主义”的形而上学。在结构主义那里，我们通过我们自身的多层言论或科学方法建构起一切事实。新实在论则认为，我们认识的对象不只是被建构的事实，而是作为自身存在的世界。新实在论是后现代“以后”的哲学，最重要的是它反抗了现代虚无主义，把对人生的意义的问题重新拿回我们的手中。

第三，相对主义批判。这不是加布里尔本人的提法，而是日本青年哲学家千叶雅也解读出来的“新实在论”的思想内核。千叶雅也的《本质主义和相对主义对立之外的第三条道路》<sup>①</sup>，是《为什么世界不存在》日译本问世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书评之一，他提出加布里尔解决了“本质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这一困扰思想界长达半世纪的难题，在日本哲学界反响很大，引发了学者关于“新实在论是否超越了相对主义”的激烈讨论。

千叶雅也以看富士山为例，解释本质主义和相对主义在极端纯粹化情况下是如何对立的：A 和 B 从不同的场所看富士山。在本质主义看来，富士山是唯一的实在，A 和 B 从不同角度看到的分别是“A 的视线中的富士山”和“B 的视线中的富士山”，不同视线中的富士山并不是实在；在自然科学看来，富士山的实在应该用物理和数理来说明，并且只有这样才是真实的；在相对主义看来，我们往往只是懂得从某个视线去看主观构建的富士山，但无法访问实在的富士山。

本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对立在“后现代”思想以后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在人文学科，“一切事物都是幻想”的相对主义倾向增强了。加布里尔则对这一难题发起了挑战：“A 的视线中的富士山”和“B 的视线中的富士山”都是真实的，事物的实在与特定的“意义场所”不可分，“从 A 看”和“从 B 看”形成了意义场所，因此 A 和 B 视线中的富士山不是主观的构建，每一个都是实在。而富士山本体则是诸多实在的视线的交错，完全孤立于意义场所的富士山本体是不存在的。就这样，加布里尔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把相对主义彻底化了。

第四，西田哲学和加布里尔研究。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现代哲学的创始人西田几多郎的哲学与加布里尔的思想具有很强的亲和性，例如，自由思

---

① 千叶雅也：『本質主義 vs. 相対主義に対する第三の道』、『本』2018年2月号、東京：講談社。



想、人是动物的思想等。特别是西田哲学的“场所”思想强调“存在”和“场所”不可分割，而存在最终归向无，与意义场所的存在论很类似。

除了上述四个共同的关注点，以斋藤幸平为代表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以下两个方面感兴趣：

(1) 后现代批判与民主主义的关系。在对谈《在多元化世界的缝隙间：検証マルクス・加布里尔的哲学》<sup>①</sup>中，宫崎裕助对加布里尔的后现代批判提出质疑。他指出，德勒兹、德里达乃至福柯或康德都认为，主体的解释框架在直面不可能中突破界限，以此可以预见裹挟主体的体制本身的变革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加布里尔的后现代批判无非是指后现代思想中原本就有实在论，他理解的后现代的内核是非常通俗化的东西。总之，加布里尔把对手当成一动不动的稻草人，构不成对后现代的批判。对此，斋藤幸平从民主主义、社会运动的角度对加布里尔的后现代批判给予肯定。从性别规范到殖民地统治，近代欧洲的理性中心主义的普遍主义都是由知识的权力性构建起来的，其中包含着压抑和排斥。后现代主义提倡要从这种压抑和排斥中解放出来，其初衷是好的。但是，后现代认为要解构一切事物才能变革社会，这种战略过头了：一切事物都是被建构起来的，这种观点会威胁真理和普遍性，进而导致相对主义的蔓延。新实在论则试图把一切被解构的东西归位，重新建构以事实和普遍性为根据的理论。在今天，具有排外性质的大众迎合主义日渐抬头，对于束手无策的左派来说，新实在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后现代主义拒绝知识的历史性和权力性，而当人们对自己所获得的知识都产生怀疑，这种自我矛盾会产生犬儒主义，进而导致保守主义的抬头。就是说，本是开放的后现代主义最终成了自己的反面。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批判也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世界不存在》强调意义场所的多元性，正是暗含着民主主义的政治诉求，尽管加布里尔本人并没有提及民主主义。该书在全世界范围内如此畅销，原因也在于此。

(2) 自然与生态。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处理现实的自然科学与结构主义的人文学的对立。许多学者试图通过批评人文学的结构主义来克服二者的对立，加布里尔则提出了自然科学中潜藏着结构主义的危险。自然科学的结构主义是一种神经细胞的结构主义，即一切事物都是人脑的反应，我们无法到达现实。

---

① 宫崎裕助、大河内泰樹、斋藤幸平：『多元化する世界の狭間で——マルクス ガブリエルの哲学を検証する』、『現代思想』46(14)(臨増)、2018年10月。

而这种结构主义的背后是由粒子和神经中枢解释世界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说，自由科学是由唯物论和结构主义共同构成的，而这正是加布里尔反对的原因。生态问题也是如此。布鲁诺·拉图尔提出社会和自然完全混合，因此自然本身不存在——混合论使“守护地球”丧失了意义；拉图尔的新唯物论哲学还认为，物是在当下被黑箱化了的时空中各种力量关系的凝结，所以现在发生的自然灾害、气候变动等不只是人自身的问题——人本身的责任被缓和了。这样只会导致气候工程学接管对环境的管理，技术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即便在关于“人类纪”的讨论中，也出现了一方面运用混合论与唯物论共同作用将人的责任最小化、一方面推进技术介入的思想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从不同于拉图尔的角度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实在论，对于我们推进人与自然的问题研究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六、阿伦特与马克思思想联系

立命馆大学的百木漠在本年度发表专著《阿伦特的马克思——劳动与极权主义》<sup>①</sup>。在日本，研究阿伦特的学者很少涉及马克思，对阿伦特和马克思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更是少见，在这个意义上，百木漠的这部作品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白。

该书主要解决两个问题：(1) 从阿伦特批评马克思的角度看，《极权主义的起源》(后文简称《起源》)到《人的状况》(后文简称《状况》)的逻辑一致；(2) 劳动和极权主义具有亲和性。作者认为，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经济乃至出现“劳动至上主义”苗头的今天，厘清阿伦特在何种程度上“误读”了马克思，对“劳动”进行重新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章的题目是“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与《人的状况》之间”。该章指出，《起源》和《状况》两部作品表面上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从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批评的角度看，两部作品是内在一致的。作者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阿伦特《起源》以后的手稿，特别是《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一书。具体而言，马克思正确地把握到了近代以来的劳动形式，并对劳动给予了高度评价，阿伦特则始终反对对劳动的赞美；《状况》对劳动、工作、行动的区分在之前的手稿

---

① 百木漠：『アーレントのマルクス：労働と全体主義』、京都：人文書院、2018年。

中早就已经有所体现，从《起源》到《状况》阿伦特对劳动的立场是一致的。

第二章的题目是“阿伦特与马克思的劳动思想之比较”。文章指出，阿伦特认为劳动只不过是作为动物的人以满足生命的必须为目的的行为，这是对马克思劳动思想的误读。马克思并非简单的劳动赞美者，而是严厉批评异化劳动的思想家，他思考劳动的用意是区分异化劳动和联合的劳动，且后者才是作为人的本质的东西应该被肯定和恢复。在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导致劳动者孤立的立场上，阿伦特和马克思是近似的；马克思那里，作为人的本质的联合的劳动具有丰富的含义，它兼具社会性与创造性，同时也包含了阿伦特的“工作”和“行动”之意。因此可以说，阿伦特和马克思的劳动思想具有一定的亲和性。

然而，阿伦特反对马克思把人定义为劳动的动物，因为这会把人的一切行为都拖进劳动的范畴中去，劳动被赋予过多的意义，这是现代社会中“庞大化的劳动”（作者还把这种状况称为“劳动的奇美拉化”）思想出现的根源。劳动的庞大化代表了生存之必然性的弥漫，这恰恰是极权主义的征兆，阿伦特之所以“误读”了马克思，原因也在于此。

第三章讨论的是与劳动相关的政治和闲暇的问题。阿伦特批评马克思的劳动解放观点，认为这与马克思对劳动的赞美相互矛盾。作者认为这也是对马克思的误读，因为劳动者由官僚机构管理进而获得政治解放的主张不是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于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作者进一步分析了阿伦特为什么批评劳动解放：从劳动解放后获得的闲暇和去政治化的消费融合一体了，如同德国纳粹利用闲暇强化国民一体化一样，这种去政治化的消费指向了极权主义。

第四章“‘社会’的根源”重新审视了阿伦特的社会概念。阿伦特非常警惕“社会”，她认为，社会是近代以来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暧昧化而出现的東西，私人领域本来是受自然支配的领域，但是生命—自然却跨越了原本的私人领域扩张到了人为的世界（公共领域），这是非常危险的。换言之，阿伦特在“社会”的背后看到了自然。作者在这里用“自然的不自然的成长”来形容阿伦特对社会的理解。生命—自然本处于循环的运动中，自然侵占公共领域以后，以往循环状态的自然就开始了不自然的发展，即自然的无限膨胀；与此同时，政治也向经营生命—自然的极权主义性质的生命政治（福柯语）转变，个体过于关心自然和自身而退出了对政治的参与，公共领域崩溃，人变得孤立化，社会也产生了多余人。

第五章“‘多余人’的废弃”厘清了资本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逻辑一致性，

可以说是本书的核心。作者在本章分析了《起源》，指出阿伦特在参考马克思派的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把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态。资本在自我增值过程中会愈发不满足于国内市场，产生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为了解决这些剩余的“多余物”，资本运动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向海外的殖民地扩张，这就是英国、法国等海外帝国主义的做法。另一方面，德国、俄国等产业革命相对落后的大陆帝国主义，采用了“人种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排斥其他人种达到解决国内多余人的目的。就这样，帝国主义转变为极权主义，“多余物”被废弃了。作者依照阿伦特的观点，重新架构了资本主义在不断积累、扩张过程中转变为帝国主义，继而极权主义化的过程。

第六章的标题是“‘劳动的动物’可能‘政治’吗”。作者注意到阿伦特对劳动者的态度发生变化：阿伦特早期一直抵触劳动，认为劳动不过是被生命必然性束缚的东西，一味劳动的人不过是“劳动的动物”，没有政治、行动的自由；但是，《状况》里阿伦特却高度肯定了劳动运动。作者推断，阿伦特的变化可能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劳动者自觉建立评议会有关。也就是说，阿伦特对劳动运动发生改观，不是因为劳动者谋求工资的提高或劳动环境的改善，而是看到劳动者能够积极地、自发地参与评议会制度。这表明，劳动者从“劳动的动物”向展开政治活动的人转变。因此，作者提出，把只关心利害的“劳动的动物”和参与超越个人利害的“公共事务”的“劳动者”做出区分，应该可以作为重新理解阿伦特的一个方向。作者还认为，劳动者参与政治（评议会）的现象是很难维持的，维持的可能性不在于把劳动作为消费品的生活活动之核心的社会，关键是在于建构具有持续性世界的“工作”过程中赋予“行动”以“不死”的性质。

终章“从‘劳动’到‘工作’”是本书的主要结论：劳动的无限膨胀具有极权主义的倾向，而为了回避这种危险，比起通常被认为是阿伦特最重视的“行动”，制造世界的“工作”也许更为重要。作者在这里再一次确认，阿伦特区分了只是用来维持生命的“劳动”与制造“使用对象物”而形成世界的“工作”；“工作”制造出持久性的东西，一方面提供了我们活动的舞台，一方面记录和记忆了我们的活动。以往的阿伦特研究大多不够关注“工作”，事实上，阿伦特的人类活动的三要素——劳动、工作和行动应该保持“三角形”的平衡。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